

改革开放的40年,对于我来说有着一特别的情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我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农村青年,幸运地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实现了人生的追求和梦想。

我是从1978年,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那一年开始读书写作的。1977年秋我在定远县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谋到一份差事,要我做图书管理员。当时那里有个小小的图书资料室,除理论著作外,还有几本“幸存”的文学名著,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文学。没想到几本文学书籍竟有如此神功和魅力,几乎占用了我的全部业余时间 and 节假日。随着“拨乱反正”的推进和深入,各地出版社又新版和重版了一大批文学名著,这对我这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来说,简直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尽管当时我的月工资只有36元,我还是从每月的工资中挤出半数来买书。大约两三年时间,我的小屋内已经堆满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梅里美、雨果、莫泊桑、高尔基、鲁迅、巴金、茅盾、曹禺、丁玲等一大批中外名家的著作。有了这些书籍,我就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久而久之,读书成了我生活的习惯,成了每天的必修课,一天不读书就觉得生活少了点什么。真正体会到读一本好书就如同与先贤、大师之间展开一次心灵对话,感受他们高尚的人格力量。我在长期读书自学中坚持写读书笔记、抄格言、记典故,真正做到脑勤、眼勤、手勤,有时兴之所至,还画点尾花和小插图来点缀,然后分类整理。就这样读着、写着、想着,一股创作的欲望涌上心头,童年的记忆和现实生活的碰撞,迸发出文学创作的火花。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非得宣泄不可,于是我真的动笔写了起来。

谁知写文章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几年间我接到各地报刊编辑部的100多封退稿信,当有人看到编辑部统一印制的“版面有限”“原稿退回”不予刊登的退稿信时,竟说什么“小金投稿,版面有限”,“小金投稿,完璧归赵”。他人的嘲讽,一时让我极其痛苦和彷徨。一天,我在资料室里无意翻到茅盾先生为高尔基逝世10周年所写的一篇祭文,才晓得这位举世闻名的大文豪童年生活竟如此艰辛。他8岁失去父母,到处流浪,白天在轮船上打工收盘子,受尽老板的凌辱,晚上则在轮船里读书自学,又屡患病,而大部分作品就是在这样背屈颠沛的环境中写出来的。高尔基的苦难童年与我很相似,尤其是他刻苦读书与生活抗争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几年后,我的新闻作品和文学作品终于开始见诸报端了。

1982年我有幸被调至省城新闻单位任编辑、记者。我在农村采访中,耳闻目睹了家庭承包责任制给这块古老贫穷的江淮大地所带来的勃勃生机和天翻地覆的变化,广大农民终于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关于这一点,像我这样从当年大饥荒中熬过来的人感受最真切、最强烈,也最有发言权。于是我怀着无比激动和感恩的心情奔波于大江南北、淮河两岸,大书特书改革开放后的新农村、新变化、新人物。凡是能表达思想情感的文体,不论是消息、通讯、报告文学或是小说、散文、评论我都写。

199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我想写一本反映安徽20年改革全貌的大书。安徽有17个地市、66个县,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在短时间内走遍安徽、写遍安徽谈何容易!如果不这样做就没有说服力和权威性。为了节约时间,在采访的途中我遇车就坐,拉货车、农用车、拖拉机、三轮车……至于无路无车时,那只能迈开双脚向前走了!采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如先联系好的采访对象突然因事找不到,这就需要等待或第二次、第三次再来。还有事先决定采访的典型,当你马不停蹄满怀信心赶到时,却

那只老秤砣,肯定不止40岁了。

40年前,也就是1978年的一个冬夜,安徽凤阳小岗村的一伙农民干了一件“硬事”。他们陆续来到会计严立华家,经过一番商讨,签下了一份“生死”文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他们或许当时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这次“自救”行为竟然点燃了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第一声爆竹。

当时的小岗村,是以“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而闻名于世的三靠村。村里经常闹饥荒,农民大多外出乞讨。为了让大人孩子们吃上饱饭,这18个村民摁下红手印,用乡间方式共同起誓,瞒上不瞒下,瞒外不瞒内,把田地分到各家,搞包产到户。说来也够神奇,这简单一“包”还真见效,第二年小岗村粮食总产量一下子跃至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人均收入达到400元,是上年22元的18倍。小岗村20多年靠国家救济粮的历史就此结束,常年忍饥挨饿的村民终于吃上了饱饭,他们当时的欢喜之情可想而知。

1978年,其实并不遥远。我的故乡吕寨村地处冀南平原,记忆中当时并没有小岗村那样的贫困,但日子也确实不好过。村里人家基本有饭吃,但没多少营养。小的时候,我吃过掺糠的窝头,也到地里挖过野菜。1978年,我考到县城读初中,从家中带去的全是窝头,有玉米面的,还有高粱面的。粮食很名贵,长了毛也舍不得丢,统一桶接着吃。我们班有个同学叫张俊刚,家里条件好,经常带白面馒头去。他成了班上的“金财主”,经常被大家“打劫”。俊刚人挺好,即使被打劫一空也不跟同学们着急,而是悄悄回家再取。但是时间长了,到底撑不住,不得已从家里带一个小木箱,把吃的东西锁起来。同学们也觉得不好意思,此后“打劫”的事才少了许多。

我们村1981年开始实行包产到户,比小岗村晚了三年。村民们先前的日子勉强过得去,要不是省里开会号召,估计还会一直拖下去。我们村包产到户同样立竿见影,家家的粮食一下子多了许多,个个高兴得不拢嘴。那年夏天我升入高中,伙食得到明显改善,可以有馒头吃了。我祖父是老党员,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做过一任村支书,最先感受到时代精神。那年他在106国道边开了一间小饭馆,生意不错,人也精神了许多。周末回家可以到祖父的小饭馆打牙祭,吃上一盘肉丝焖饼。有时祖父还会把肉皮切成细条,跟咸菜一炒,香喷喷的,装进罐头瓶里,让我上学带着。那是我一生都会怀念的美味,现在想起来似乎还能闻到那股香气。

今年秋天,我第一次去小岗村。这注定是一次难忘之旅。小岗村有一处“当年农家”,是2008年打造的人文景



## 40年的梦想感恩

□金兴安

发现与事实不符,结果只能放弃,重找新典型,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打击是1998年6月20日夜间火车上,我的手机、照相机、现金、证件还有写好的10万多字书稿全部被窃,真是欲哭无泪!怎么办?别无选择,只能咬着牙重新开始……1998年12月,一本32万字的大型纪实文集《安徽大采风》终于如期出版了!后来,安徽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金兴安作品100篇》,被誉为《安徽大采风》的姐妹篇。所不同的是《安徽大采风》侧重采写安徽各地的先进典型事件,而另一部作品集则侧重报道安徽各类先进典型人物。

2011年我退休后,有了大把的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几年间我又连续出版了很多图书。算起来,我的读书写作是与改革开放同步“成长”的,至今整整坚持了40年。回忆我的成长历程,是读书写作改变了我的人生。

“感恩乡亲”则是几十年来埋藏在我内心深处的诺言,是我在孩提时刻刻骨铭心的记忆。1960年大饥荒,父母死于饥荒,刚上小学二年级的我不幸沦为孤儿,在饥荒线上垂死挣扎的乡亲们并没有遗弃我,反而更加关怀我、爱护我。东家大婶送碗粥,西家大叔送碗汤,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孩子。从那时起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播下感恩的种子,发誓长大后一定要感恩乡亲们。面对着家乡的贫穷和落后,特别是文化生活的贫穷和落后,我强烈地感受到农村需要文化,农民需要知识,要用先进的文化来占领农村阵地。我说服了家人,将自己几册藏书和多年的积蓄全部捐出来在家乡创办农家书屋。2004年7月,书屋建设正式启动。从选址、设计、建筑、采购,每一块砖、一块瓦、一袋水泥都要我精打细算和精心安排。在筹建的一年多时间里,为解决资金的缺口和图书的不足,我利用节假日、双休日往返合肥、滁州、定远、蒋集镇等地达38趟。最难忘的是2005年盛夏,书屋主体工程藏书馆上大梁,可我的椎间盘突出犯病了,家人劝我打个电话,不要去工地了,但我想这是盖房的关键环节,我还是戴上

钢板腰围带,吃了止痛片,准时地赶到工地现场。正在盖房的乡亲们见我带病来到工地大为感动,表示一定要把书屋保质保量盖好。书屋开馆后的第一个春节期间,我去书屋时,只见借书的、看书的几乎全是学生和老教师,很少看到农民在书屋,一问得知大部分年轻人都出门打工,在家的老人大多不识字。为解决这一难题,我决定再盖三间农民阅览室,让不识字的农民看光盘、看电视学习科学种田知识。我把家里为儿子准备结婚的2.3万元拿出来购买建材。当时合肥市正在进行大拆违,城郊设多处摊点出售旧建材。我和家人挤公交去郊外,一个一个摊位比较价格,然后讨价还价,我多次押车送木料、砖瓦等旧建材,很快盖成了三间带走廊的农民阅览室,于2006年7月正式投入使用。尽管在书屋建设期间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事、麻烦事,甚至还遭到热嘲冷讽,但一想到将实现感恩乡亲的夙愿,让乡亲们用知识和文化走出贫困、走向富裕,心里就感到从未有过的获得感、荣誉感和责任感。

“感恩乡亲办书屋”的消息被媒体报道后,北京、上海、山东、福建、新疆、安徽等省内外许多知名作家、艺术家纷纷寄来他们的作品和藏书。

蒋集镇农家书屋开馆15年来,全民阅读已成风尚,读书成效得以显现。据图书管理人员统计,已有15多万人次来此借阅图书、报刊和观看光盘。如今,中小学生和教师成了这里常客,村民们已经尝到读书的甜头。2006年,书屋被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授予“育才图书室”;2018年2月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授予“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的称号。

回望我这40年,从一个孤儿到成家立业、儿孙满堂,从中学学历的农村青年到编审和作家;从孩提时代埋在心里的感恩诺言到成功创办全国第一家农家书屋……这一切的一切,全是改革开放造就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的今天。国逢盛世,我逢春天,我要感恩这辉煌的40年。

后来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决定在心底寻找这样一个布置带给我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暗示或者冲击。

那只老秤砣,越过40年光阴幸运地保存了下来,大概还会这样静静地存在下去。它的秤杆是木头的,经过40年,或者断了,或者朽了,或者用不着了当柴火烧了,消失得似乎很自然。所以,我觉得在那间茅草屋里,单挂这么一个秤砣,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只老秤砣,今天所看到的,当然不是它曾经的样子。当年它大概是簇新的,和它的秤杆一起称出一个家庭红火的日子。今天的老秤砣退出了历史,成为既往历史的一份见证。那座茅草屋也是。当年它遮风挡雨,陪伴一个家庭从贫困走向富裕。而今它以荣退的身份,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看着它近乎丑陋的身躯,你大概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当今确实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40年已经把同一个地方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模样。若不是刻意保留下这样一座茅草屋,小岗村40年前的面貌,恐怕只能尘封于亲历者的大脑中了。

那只老秤砣,被自然拣选出来,静静地挂在那面黄土墙上。它沉默不语,却又似乎在诉说着那段乡村岁月的某种隐秘。

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后,人人都可以用自家的秤称自家的粮食、棉花,家家丰衣足食吃不完、用不完,获得感陡升。秤是市场交易赖以运行的基本工具,在纪念小岗村光荣历史的景观中把老秤砣凸显出来,是颇具意味的。

说起小岗村,人们喜欢把它与“包产到户”画等号。这其实是对小岗村经验的过度窄化。这种简单思维曾经束缚了小岗村人的手脚,导致他们“一夜脱离贫困线,20年未进富裕门”。2004年,安徽省委选派省直干部沈浩到小岗村担任支部书记。他带领小岗村村民痛定思痛,再谋改革,通过土地流转,回归“集体化”,发展规模经营,终于扭转了多年徘徊不前的困难局面,村民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所以,“包产到户”只是小岗村初期的、技术层面的经验,从根本上说,通过改革让村民过上富裕生活,才是小岗村经验的实质之所在。

忽然想到一句话:“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尘土埋真金,或许,这才是那只老秤砣最想告诉我们的秘密吧。

事实上,它也无须多说。你走到它跟前,别样的历史画卷自然就会慢慢为你打开。

40年前,雪峰山下的老家麻溪村还叫麻溪大队时,能不限量盛上几碗纯白米干饭,是多数人家年节里才有的奢侈事。

爷爷家四口人,除了年事已高的爷爷奶奶日复一日给生产队放牛、摘茶叶、晒谷子或者做别的活换取工分外,尚未成家的叔叔和小姑每天也要起早贪黑出工,算是队里的壮劳力。但分到家的粮食总不够吃,一日三餐都是黏糊糊的稀饭,像稻田里一脚踩去能吞没膝盖的烂泥。叔叔或许饿极了,端上粗糙的青花瓷碗,就着几筷子腌菜或萝卜条,喝得稀里哗啦,像在门前垄里风风火火犁田,能震下屋子老旧板壁上的尘埃。

我家与爷爷家隔了好几垄田。幼年的我常去他家玩,也常看到叔叔吃饭时像被从“饿牢”里放出来的模样,却极少被留饭,似乎我不是亲孙子。一次几里外的大队部晚上放电影,片名是《小兵张嘎》,我听说后异常兴奋,一阵风跑到爷爷家,打算求小姑带我去。爷爷家在吃晚饭。见我进门,正在一口乌黑铁锅前盛饭的爷爷绽开褶皱挨挤的笑脸,热情招呼说:“文娃来了,吃一碗吧?”蓦地,他似乎感觉屋里气氛不对,瞥了一眼奶奶,穿着青布对襟衣衫的奶奶低头扒着桌上的半碗饭,默不作声,身后细瘦麻杆一般的小姑又等着盛饭。于是,他的眼神骤然黯淡下去,客套话没再说第二遍,默默盛了自己那碗照得出花白胡须的稀饭,坐到一旁的春凳上自个儿吸溜起来。多年后,那晚看电影的场景早无丝毫印象,但爷爷无奈的神情却始终清晰如昨。

我家的境况刚好与爷爷家,不过也仅限于米饭稍干。这得益于母亲的巧思能干,常掺些红薯在锅里,米饭便不用煮得那么稀烂。红薯与米饭的口感自然不能比,我盛饭时常皱着眉头将褐黄的红薯扒拉到一边,专捡米饭往碗里装,红薯上沾着的零星饭粒也小心刮下来。饶是如此,红薯也吃了不少,因家里还有三个弟妹,都和我一个心思,米饭便很难盛上第二回。这是我多年后讨厌红薯味的缘故,街边遇到的烤红薯摊点人气再旺,专家们又如何喋喋不休说红薯能除毒抗癌,我也匆匆躲过。

家中日子虽紧巴,母亲却有一副热心肠。平日村里有一时揭不开锅的长辈或平辈乡邻踱上门,红了脸嗷嗷着求借一升半升米,她总爽然答应,麻利地到屋角掀开半空的米桶,令求告者溢满喜色,千恩万谢而去。母亲甚至还容留过外来讨米的一家人,足足住了一个月。这家人是一个妇女带了一双年龄比我稍大的儿女,一路要饭到了我们村里,母亲觉得可怜,让他们住在我家空着的厦屋。白天,他们出去走村串户要饭,晚上便回来睡在我家。偶尔讨回一点米,母亲兑上油盐菜蔬给他们煮了,或者用微薄的钱与粮票和他们兑换。那双儿女眉目清秀,我也喜欢跟他们玩。

几年后,公社改称乡,麻溪大队改成了麻溪村。家里忽然分到了好几亩田,父母也不用给生产队出工了,后来才知是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弟兄几个年岁还小,也都跟在父母身后,扯秧、担秧、插田,虽然辛苦,碗里却已没了粗糙难咽的红薯,而是纯净软和的干饭。母亲也不再限量,任我们敞开肚皮吃了。家里来了亲疏不一的客人,母亲总扯着对方的衣服真心留客,漾着春风般的笑脸。

大概是1984年秋收后的一天,村里的组长学告伯拿着纸笔到我家,笑嘻嘻地问母亲家里粮食收成情况。母亲客气地让座倒茶,却面有难色,犹犹豫豫不肯说。学告伯说:“不用担心,只是上面要统计数据,不会让你多交粮食。”母亲这才赧然笑了。后来,我从权威的书上才得知,这一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40731万吨,比1978年增长了10254万吨。无怪乎村里再也见不到讨米的人了。

流年带走了亲人,却未能阻止日子云霞般变幻的脚步。转眼间,我已成年,远赴外地工作,结婚,生子。白米干饭再也不是我的心事。大街小巷的超市与品种繁多的袋装大米前,我开始如当初选女朋友般挑剔起来。先是摒弃米质疏松、品质较差的早稻米,专拣品质上佳、营养价值更高的晚稻米。不久,一家人的口味又刁了,便只挑外表纯白、晶亮的东北大米。到后来,市面上满是进口的泰国香米,趋者若鹜。

令我没想到的是,这一两年,妻子开始不吃晚饭,顶多吃一个水果,说同事们都在减肥,自己也要减减,这个月争取减两斤;儿子则常对着一锅香气扑鼻的米饭皱出当年我爷爷一般的沧桑眉头,苦大仇深的样子,说不想吃。说着,溜到客厅的茶几边,吃起了堆叠的薯片、炸鸡块、牛肉片、火腿肠、卤豆干和海苔片等零食。剩下我独对热气与清香腾腾的餐桌,兀自发呆、叹气。

偶尔,一家人外出逛街,遇到卖烤红薯的摊点,儿子会惊喜地奔过去,一手拿一个跑回来,脸上满是绚烂的笑意,连声说好吃、好吃!望着他甘之如饴的神情,我一时感慨良多。国家40年的改革开放,不止让社会如阳春般日新月异、生机勃勃,也将我们一家调理成林黛玉的口味与肠胃,刁钻而古怪了。



## 米饭往事

□张雄文